

# 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

简玉祥



一九一九年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合影

新民学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社会团体，其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民学会于1918年4月由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人发起建立，至湖南党的组织建立之后即自行消亡。其在促使先进知识分子认识、认可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湖南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 新民学会的演变

近代以来，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以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普遍怀着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步以及求友互助的心态，以及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要求过一种动的和团体的生活等。在上述因素影响之下，毛泽东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成立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亦规定了该会的纪律要求，即会员必须遵守“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纪律的约束，且要求会员必须定期汇报自己的研究心得等等。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新民学会成立初期是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着向上和进步的进一步团体。虽然毛泽东等人亦主张对社会问题进行探索 and 改革，但如何进行探索和改革在当时尚不明确。尽管如此，毛泽东、何叔衡等知识分子成立的新民学会，为他们举行活动、进行思想碰撞等提供了阵地，并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诚如上述，新民学会的会员大多都是怀着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加之他们出身相似、经历相似，虽然在初期思想比较幼稚，但都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并具有为国献身的奋斗精神。这些特质亦赋予了新民学会朝气蓬勃的生命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相继传入中国，新民学会在如此纷繁的思潮之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等，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该会的指导思想，自动担负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使命，这与新民学会的特质及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等人开始关注俄国发生的这场革命及指导这场革命的理论 and 思想，在实践中，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此背景之下，深入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实践的过程中亦作出了类似的选择。如毛泽东曾先后两次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并结识了李大钊等人，开始接触马列著作及宣传马列的相关刊物和杂志，受此熏陶，毛泽东在思想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其他会员如蔡和森则在赴法勤工俭学之际，翻阅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将当时兴起的各种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最终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革命的经验，并将当时兴起的各种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最终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新民学会会员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停留在理论的探讨层面上，还运用到了实践之中，如于1919年发起驱逐张敬尧运动，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加之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更加坚定了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成为该会的行动指南。

新民学会从成立之初到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是国内外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 创办进步报刊，刊载相关理论文章

新民学会会员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该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之后，即投入到了自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之中。创办进步报刊，刊载相关理论文章，是新民学会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手段之一。例如毛泽东仿照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虽然该刊创刊没多久即遭查封，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湘江评论》设置的主要栏目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等。毛泽东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例如《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毛泽东在该文中热情歌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及其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并认为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求得彻底的解放。

《湘江评论》这种反帝反封建的决心，使得其成为反帝反封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力阵地。正是由于《湘江评论》的这种广泛的社会影响，被远在北京的《每周评论》所关注和认可，并将其称之为“好兄弟”。

《湘江评论》的存世时间并不长，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思想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为湖南革命运动的发动奠定了思想基础，许多有志之士正是在此影响之下走向革命道路的。

《湘江评论》虽然被查封，但在其影响之下，湖南大地上的新型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新湖南》《湘潮》《新时代》《岳麓周刊》《明德周刊》《女界励进

会旬刊》等等。这些报刊不断传播着新思想和新思潮，不断启迪着广大群众，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引导人民群众认清了北洋政府统治的黑暗现实，为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 创办文化书社，销售进步刊物

创办文化书社、销售进步刊物，是新民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手段。

文化书社由毛泽东等人发起，其创办的主要目的在于销售进步刊物，宣传新思想。起初由于资金及销售刊物有限的制约，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解放人们的思想，毛泽东主动担负起特别交涉员的职务，主动与各方联系，扩大了资金及进步刊物的来源渠道。

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倡导下，其他地区相继创办了文化书社，如陈昌等创办的湘西文化书社、何叔衡等人创办的宁乡文化书社等，都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为了能够使工农群众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书社明确规定凡是工农群众前来购买进步刊物的，一律按照进购价格售卖，不赚取利润。

文化书社销售量最大的书刊主要有《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入门》《劳农政府与中国》《新俄罗斯之研究》等；销售量最大的杂志主要有《劳动界》《新青年》等。通过销售量最大的刊物和杂志可以看出，基本上都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及怎样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有关的书刊和杂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尤其是在工农群众中的进一步传播。

文化书社除了售卖进步书刊和杂志之外，还引导群众去阅读这些进步书刊和杂志。如在售卖这些书刊和杂志的同时，往往在其中会夹两张宣传页，一张是对购买这些书刊和杂志的读者的感谢，另外号召读者为类似的公益事业作出贡献。另外一张则是教读者如何读这些进步书刊和杂志，并论述了关门研究的危害等。

通过上述种种措施，文化书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为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广大有志之士正是在此影响之下加入党组织的。

## 创办新式社团及新式学校

新民学会还通过创办新式社团及新式学校，培养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队伍。

在新民学会会员的努力之下，湖南全省相继成立了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一批新式社团。顾名思义，上述两个社团组织都是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及俄国相关问题的，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员经常会在一起传阅《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刊，毛泽东甚至在该会作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两次重要的演讲，激发了会员的研究热情。

为了抵制反动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该会会员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学说及俄国革命之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刊登在一些重要报刊上，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俄罗斯研究会是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的社团组织，该会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一是会员的研究心得刊登在俄罗斯报上；二是为了切实了解俄罗斯的实际情形，派员赴俄罗斯进行调查；三是倡导留俄勤工俭学等。同时还邀请在上海的俄国人来湖南讲授俄罗斯的相关知识，并开设专门的俄文班等。

在上述背景之下，一些进步青年如刘少奇等在上海接受相关的学习和培训之后，就转赴俄罗斯留学，成为我党早期的骨干力量。

除了创办新式社团外，创办新式学校亦是宣传和培养马克思主义骨干力量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新民学会会员在湖南创办的自修大学和工人夜校等，成为社会各阶层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场所，并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为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及组织基础，并为湖南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

新民学会通过创办进步报刊、文化书社、新式社团及新式学校的形式，大力宣传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自觉同其他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实用主义进行斗争，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扫清了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进一步传播。其在促进湖南知识分子认识、认可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骨干。

(作者单位：黄淮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 陈毅对马一浮用“激将法”

崔鹤同

被称为“国学大师，一代儒宗”的马一浮，一生饱读诗书，潜心学问，安贫乐道，不出仕、不当官。1952年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来访，使马一浮改变了人生态度，欣然走出书斋，为祖国的文史事业贡献力量和智慧。

那天上午，陈毅由浙江省文教厅长刘丹陪同，轻车简从。马老家人开门后也不知是陈毅来访，就率直相告：“先生正在休息，请稍待。”陈毅摆手，说：“不必惊动，稍待再来。当陈毅二人欣赏了附近花港公园第二次来时，马仍未醒。这时，天已落起毛毛细雨，家人让客进屋，陈毅说：“未得主人允许，不能急着进入。”于是站在屋檐下等候。

后来，马一浮听说有客来访，已等很久，连声说“请”，见来客被雨水

淋湿，深感歉疚。得知其中一位是赫赫有名的陈毅元帅，更为惊讶。于是闻名海内外的学者和文韬武略的儒将便毫无拘束地畅谈起来，内容广泛，玄学、禅学、宋明理学、诗词、书法，相谈甚欢。

陈毅来沪，主要是请马老“出山”。但马老无意仕途，打算“鬻书代劳”，以自食其力。这时，陈毅就用了一个“激将法”，说：“过去，国民党掌权，您老不出仕；现在，我们当家了，您老还不出？”经过这次推心置腹的交谈，马一浮为陈毅的学识、口才、真诚和风度所折服，从而引为终生知音。相见不久，马一浮同意应聘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翌年3月，又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首任馆长。又过一年，被邀请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特邀委员。

## 钱玄同为刘师培遗书作序

沈治鹏

钱玄同与刘师培皆为章太炎弟子。钱玄同在研究音韵、训诂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刘师培在经学方面的成就可与章太炎比肩。

后来钱玄同投身新文化运动，思想最为激进。钱玄同对旗手陈独秀说：“要搞文学革命，旧瓶装新酒不行。你和胡适都尚用腐儒腔，之乎者也，我提议，今后《新青年》应一律用白话文。”而刘师培却投靠清政府，后又为袁世凯称帝鼓吹，成为章门弟子中复古的代表，与章太炎分道扬镳。

尽管刘师培曾经两度失节，在蔡元培力保之下方免杀身之祸。后蔡元培力保一身病弱的刘师培到北大任教，幡然醒悟的刘师培感激涕零。1919年3月，林纾在攻击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时，欲拉刘师培等人声援。刘立即发表声明：“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多年，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巴人汲水记》月刊由文科学界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这一声明，表明他

与新旧文化运动各美其美、并行不悖的文化主张。

是年11月，钱玄同去看望病入膏肓的刘师培。大师兄拉着师弟的手：谢谢你和蔡先生、仲甫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就要走了。作为过来人，在中国，研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我是最早的人。仲甫和你的文化观点远比胡适激进。仲甫和你几乎否定了汉赋、唐诗、宋词在内的全部古文学。谁若提出研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肯分青红皂白一棒打成复辟派。我以为，这种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的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

大师兄这番话让钱玄同极为震惊。从此，钱玄同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主张。多年后，钱玄同编辑了《刘师培先生遗书》，并用他曾经反对的文言文撰写了5000余字的序言。这不是倒退，而是后来钱玄同的文化思想更趋于理性与平和。

## 徐悲鸿情定磐溪

周惠斌

1937年11月，徐悲鸿随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西迁至重庆，执教艺术系。1942年秋至1946年夏，徐悲鸿应重庆工商界著名人士石荣廷邀请，搬入位于嘉陵江北磐溪的石家花园。

石家花园院落宽阔，中间有一亭子，两侧分别是两层的小楼，隔亭相对而立，最里面是一栋砖木结构的2层楼房。院落周围有黄葛菜松，梅竹掩映，十分幽静。院坝下面，是一排“石室”。彼时，磐溪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徐悲鸿以石室为画室，在这里完成了《巴人汲水图》《巴之老妇图》等极具现实主义风格的经典作品，石家花园真实地见证了徐悲鸿艺术创作生涯的黄金时期。

徐悲鸿在寓居磐溪石家花园的4年间，经历了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悲欢离合——他现款100万元、收藏的40幅古代名画、100幅自己的作品，以及每月收入的一

半，作为儿女的抚养费，与前妻蒋碧薇协议离婚；与此同时，他也收获了自己崭新的事业和爱情，创办了中国美术学院，并与廖静文女士相识相爱，喜结良缘。

1945年冬，徐悲鸿与廖静文在中苏友好文化协会礼堂举行了热烈而俭朴的婚礼。沈钧儒和郭沫若应邀担任证婚人，郭沫若还赋诗一首，以示祝贺：“嘉陵江水碧如茶，松竹青青胜似花。别具一番新气象，磐溪风月画人家。”

新婚后的徐悲鸿过着幸福而愉快的生活，他不止一次对廖静文说：“我真找到了我所爱的人！”“我欠着你的情分，我要把我所珍爱的东西都送给你。”徐悲鸿后来把自己珍爱与满意的作品悉数送给廖静文，并在许多画作上题写了“静文爱妻保存”的落款。徐悲鸿病逝后，廖静文将这些作品全部捐献给国家（现收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其中包括徐悲鸿创作的第一幅《巴人汲水图》。

## 梅巧玲烧借条

姚秦川

梅巧玲是清朝同治、光绪时期声名赫赫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是四代京剧梨园祖业的创始人，是梅兰芳大师的祖父。梅巧玲一生不仅才艺高超，在为人处世方面，他也谦逊热忱，温和礼让。

当时，有一个名叫谢梦渔的人，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他清廉为政，至诚待人，致使生活常处于拮据之境。谢梦渔探花出身，学识渊博，通晓韵律，梅巧玲经常与他切磋技艺，时间不长，两个便结下了君子之谊。

当时，梅巧玲知道谢梦渔生活贫寒，于是常常资助对方。谢梦渔则每次都主动写好借据交给梅巧玲，多年下来，大约借了梅巧玲3000多两银子。不过，等到谢梦渔70多岁归隐道山之际，他并没有来得及归还这些欠款。当时，谢家在北京扬州会馆设置灵堂，梅巧

玲得知后，便将那些借条全部找出去，装到口袋里前往吊唁。

梅巧玲见到谢梦渔的长子后，从怀中掏出那一沓借据。看到那厚厚的一沓借据时，谢家人多少有些惶恐，其子满脸羞愧地对梅巧玲说：“这些借据我们都知道，不过眼下我们还没有能力偿还，不能再宽限一些时日，届时定当如数偿还。”

# 华罗庚严济慈通信背后的故事

严慧英

近日，一封华罗庚写给严济慈的信，在严老后人收拾旧物时，得以重见天日，让人不由慨叹这两位学界泰斗历经风雨弥足珍贵的友谊，不忘师恩尊重道的情义。

此信全文如下：  
严老师：承您多次来院访问，十分感谢。关于熊师母应有的照顾的事，我们心同此情。如果您能设法和李定副部长约好时间，我当同往，共同进言。总之一切尊重您的安排。

在这张简短的信笺中，华老表示愿与严老一同向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进言，希望国家能安排给予“熊师母”生活上应有的照顾。

信中提到的“熊师母”是二人共同的恩师熊庆来的发妻姜菊缘。熊庆来(1893—1969)，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被誉为“中国数学界的伯乐”。在科研成就上，他作为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以“熊氏无穷数”载入世界数学史册；在教育事业上，他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数学研究部和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3所大学的数学系，培养指导的科学家大家更是不胜枚举，华罗庚、严济慈、陈省身、赵九章、赵忠尧、钱伟长、钱三强、杨乐

等，均出自其门下，而这些科学巨擘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所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给予多高的赞誉都不为过。

从学生们的赫赫盛名，也可见熊老作为老师慧眼识人的“伯乐”之高明。熊老向来以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著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善于发现人才，更懂得爱惜人才，资助培养人才。在严济慈和华罗庚的成长之路上，熊老就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

1921年，熊庆来从法国学成归国之后，受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先驱郭秉文之邀，担任新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算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在此期间，他除了呕心沥血教授课程、编写教材，在人才培养上更是殚精竭虑、倾其所有。他对学生严济慈很是看重和喜爱，每次给严济慈的作业都批上一个大大的“善”字。严济慈后来作为东南大学第一唯一的一个毕业生去法国留学，熊庆来和何鲁、胡刚复一起资助他上学的费用。有一次工资发迟了，熊庆来就把自己御寒的皮袍子交给妻子送去当典当，换钱给严济慈汇去，工资到手后才将皮袍子赎回。而严济慈也不负众望，由于他在数学、物理等方面的杰出表现，法国从此开始承认中国大学的文凭。抗战时期，严济慈携家眷去往云

南，生活困难，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还介绍严济慈夫人张宗英在校图书馆工作，缓解其经济上的拮据。

熊庆来提携培养华罗庚一事，更是广为人知。1926年，熊庆来到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算学系担任教授兼副主任。1930年时，他在《科学》杂志上看到华罗庚《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不能成立的理由》一文，大受震动。当时华罗庚只有初中文凭，且腿有残疾，但熊庆来对此毫不介意，打破常规，专程去华罗庚的家乡邀请他来清华，甚至到校委会说出“不聘华罗庚，我就走”的话，力主安排他从助教做起，在学校旁听课程。而华罗庚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大学数学系全部课程学完，后来又得以直升教授，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可以说，华罗庚能成为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熊庆来功不可没。

熊老对自己的学生，从来都是倾力拔擢，无私帮助，在传道授业解惑之外，更尽力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在最好的环境和条件中得以施展，诚可谓师之大者，兼有仁心；选才育才，益国利民。而严济慈和华罗庚也严格秉持着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终其一生执弟子礼，对熊老尊重有